

井冈山时期 毛泽东如何用活语言艺术

□ 王柳芳 孙 伟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倡导者与践行者，他在领导井冈山斗争的过程中，以其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深入理解，深厚的国学功底，细致的调查研究，洞察国情和民心，经常使用浅显和质朴的语言，风趣幽默、形象生动，让广大军民对许多革命道理都能听得懂、记得住，易于接受，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从而取得明显的宣传效果。

讲地方话，关心群众切身利益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他在井冈山时期十分重视发动群众，加强对群众的宣传，特别善于学习和运用当地的语言。农民的乡土话语，往往富有生活气息，再配上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利益诉求，必将极大地启发民众的阶级觉悟，增进情感认同。

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前，毛泽东要求陈正人等人起草了一份《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宣传红色政权的主张与任务，反映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经草拟，写了三十多条，请毛泽东审阅。他将其中一些深奥难懂的语句改成了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比如，“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把“反对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把“废除债务”改为“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等。这样一改，群众一听就明白了。

当时在井冈山地区通行两种方言，即客家方言和江西方言。毛泽东在和群众沟通的过程中，不仅请讲客家话的人做翻译，而且还主动学习江西话，一看到乡亲，就亲切地喊他们为“老表”。他入乡随俗，不耻下问，以便更好地与群众交流，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毛泽东提出，要想做好群众的宣传工作，必须放下架子，看不同对象说不同的话。碰到雇农要讲雇农话，碰到中农要讲中农话，碰到商人要讲商人话，碰到工人就要讲工人话。不能一讲一大篇，只要讲一两句涉及切身利益的话，他们就懂了。比如“我们的军队是为穷人打仗的”。另外，对群众要有耐心，可以把话讲得慢一点，多重复几次，用几种意思表达同一句话。如群众听不懂“土豪”是什么意思，就可以用“财主”“有钱人”

来代替，群众慢慢就会懂得红军的话。

巧妙对比，坚定战士们理想信念

由于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面对挫折，战士们思想往往摇摆不定。毛泽东会用巧妙的方式来比对我力量，重新燃起大家的革命激情与希望，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样的比较在特定的语境下，很容易达到认识上的共通与情感上的共鸣。

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退至浏阳文市市集中。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了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并满怀信心地说：“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泽东通过小石头与大水缸的关系，反映了革命的艰巨性和最终必胜的信念。这对于稳定军心和鼓舞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不是要去与敌人硬拼，而是要保存实力，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山区去积蓄力量。

在三湾改编动员大会上，毛泽东说：“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了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是两把菜刀，而是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毛泽东通过贺龙两把菜刀起家后来当军长的故事，激励大家继续坚持斗争，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总结出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规律。这样一来，部队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

在朱毛会师大会上，毛泽东说道：“敌人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十个指头有长短，出水荷花有高低。”“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到敌人背后去‘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够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手心里玩。”一番话说得大家喜笑颜开，信心倍增。

形象比喻，帮助指战员理解红军的政策

形象的比喻能够赋予描述对象鲜活的生命力，迅速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可以化抽象为具体，变深奥为浅显，转陌生为亲切。随着革命形势的

发展，出台了不少党和红军的新政策，许多指战员一时还理解不了，毛泽东则通过恰当的比喻，让大家一下子就能欣然接受，成效明显。

当时部队中存在单纯军事思想，只想打城市，不愿待在偏远农村地区，也不愿意进行艰苦的根据地建设。为此，毛泽东有一次在给大家讲话的时候，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他把根据地比喻为可以休息的“屁股”，提高了大家对建立革命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数十年后，当年的老红军对这段话仍记忆犹新。

井冈山以前有一个“山大王”名叫朱聋子，他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对战士们说，“我们要改变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强敌来了，先领它兜个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通过战争实践，大家慢慢领会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思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首先要保存自身的实力，然后寻找机会打击或消灭敌人。

毛泽东总是能即兴地以身边的事物打比方。有一次，茅坪的群众捕获了一条狗鱼送给毛泽东，他在谈话中把狗鱼比喻为“水中的恶霸”，好似剥削和压迫穷人的土豪劣绅。他说：“我们穷人要翻身，就必须把地主、土豪劣绅打倒！水中的鱼要求得解放，就必须打倒水中的恶霸！”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正处于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摸索时期，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大众化的开创阶段。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工农群众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毛泽东经常针对部队和地方出现的某种不利于革命的现象，召集大家讲话，统一思想，凝聚人心，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坚定革命理想，不断提升马列主义水平，掌握了高超的语言艺术，成为革命的语言大师。他的讲话立场鲜明、朴素真诚，看似浅显直白，却精辟透彻，耐人寻味，极具革命性和时代性，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体现了积极乐观、不怕困难的精神以及胸怀天下的人民情怀。

抗战时期，甘肃是大后方，苏联援助的抗战物资都要经过新疆到甘肃再转运各地。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为了对外联络和营救西路军，我们党就在兰州设立了红军办事处。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正式形成，兰州红军办事处改称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基于甘肃和兰州的重要地位，党中央派谢觉哉作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代表到兰州开展统战工作，任中共中央驻甘肃代表。谢觉哉肩负特殊使命，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甘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长期以来，甘肃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都非常落后，因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非常繁重。抗战初期，贺耀祖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谢觉哉同贺耀祖是同乡、同学和同事，在大革命时期两人有过交往。贺耀祖虽然在政治上比较开明，但对抗战和共产党等问题上还有很多模糊和错误的认识。针对谢觉哉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具体主张，贺耀祖虽然表示赞同，却很少付诸行动，甚至对谢觉哉还有意回避不见。于是，谢觉哉采用书信的方式对贺耀祖进行诚恳的说服劝导。在谢觉哉的耐心教育下，以及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贺耀祖的态度和认识有了很大转变，这就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甘肃的形成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谢觉哉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兰州环境大有转变，贺比前更进步，对我们提出之问题均愿照行，对于民运，贺已无阻挠之意。”

为了广泛地开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谢觉哉根据上层人士的思想状况和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形式做好教育和转化工作。这一时期，谢觉哉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党的政策，争取和团结了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民政厅前后两任厅长罗贯华和施奎龄、国民党中央政府驻甘肃外交特派员李铁铮、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等人。此外，谢觉哉还经常接近张维、水梓等地方绅士以及回族上层人士，利用一切机会向他们介绍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争取和团结一切拥护抗日的阶层和人士。他不仅重视争取和团结上层人士，也同样重视争取和团结中下层人士，只要谁赞成抗日、反对内战就同谁交朋友，使甘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开了新局面。

营救失散西路军人员。谢觉哉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工作期间，承担的另一项特殊任务就是要设法营救和收容失散的西路军人员。谢觉哉到兰州后了解到，在河西走廊有西路军1000多失散人员，约500人在敌人的工兵营修公路。他们的待遇很差，凌晨3点

起床，每天出两次操，夜晚住在帐篷内，穿得是单衣单裤，没有铺盖。被俘的西路军女战士有200多人，在医院和工厂做工；还有100多西路军小战士分散在旅馆和澡堂当伙计，或者到国民党大官家中当勤务兵。根据这些情况，谢觉哉当即致信贺耀祖，请贺耀祖向马步芳要人。经过多方努力，从青海马步芳部队要回了刘瑞龙、魏传统等人，从国民党九十七师要回了何兰阶、陈凤祥、王文生等人。1937年10月底，马步芳把青海、武威、永登的1500余名被俘的西路军编成一个“新兵团”，准备送往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队。当“新兵团”到达兰州后，谢觉哉马上采取果断措施，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把“新兵团”移交八路军。当谢觉哉得知“新兵团”开走以后，又立即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发电报，请求设法营救。经过他们的努力争取，终于把“新兵团”全部人员营救出来。

高金城是著名的外科医生，早年在甘肃行医布道，是我们党的忠诚朋友。谢觉哉到兰州后同高金城会面，商讨到河西重新开设福音堂医院，以此掩护营救西路军人员的工作。高金城接受任务到张掖以后，以福音堂医院为掩护，公开收容西路军伤病员，利用治病的机会，传达党中央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关怀。先后从福音堂医院治愈送走的西路军人员有200多人。高金城营救西路军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8年2月3日凌晨，被马步芳部师长韩起功秘密杀害。

支持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推动下，在中共甘肃工委的直接领导下，甘肃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逐步形成。其中影响较大的抗日救亡团体有甘肃妇女慰劳会、甘肃青年抗战团、甘肃省外留学生抗战团等。甘肃妇女慰劳会组织妇女进行募捐、慰劳、演出等活动，宣传男女平等，提倡妇女放脚、识字等，并出版了《妇女旬刊》。谢觉哉不仅为刊物撰写文章，还承担了刊物的编辑工作，并就妇女工作的特点、性质和任务同倪佩君多次交谈，并给予指导。甘肃青年抗战团领导成分复杂，没有明确的目标，谢觉哉就同领导骨干多次谈话，并写了书面指示，指出青抗团是团结广大青年、担负抗战工作的。因此，“抗战第一”“抗战高于一切”。谢觉哉还经常同进步青年交谈，循循善诱，耐心启发，帮助进步青年提高思想认识。一些进步青年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介绍下，先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这一时期，谢觉哉以觉斋、焕南等多个笔名，先后在《西北青年》《热血》《抗敌》等刊物发表文章，抨击了国民党的腐败专政，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和抗日政策。他的文章简明扼要、寓意深刻、切中时弊、说

谢觉哉抗战初期在甘肃的特殊使命

□王锐

服力强，深受读者欢迎，产生了很大反响。

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1938年9月，党中央决定调谢觉哉回延安工作。9月5日，谢觉哉从兰州乘车东返，告别了战斗一年多的古城兰州，结束了在国统区的艰苦工作，返回延安。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这是一次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重要会议，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

总结经验，指明抗战正确方向。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15个月的主要经验，为抗战胜利勾画出了路线图。政治上，坚持长期作战的全面抗战路线。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中国要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就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和凶残，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的，但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就是团结全民族，依靠人民群众。军事上，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占据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就“安稳占”，没有后顾之忧，从而更加猖狂，不仅会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甚至有可能动摇合作抗战的根基。因而开展游击战争是必须的、恰当的，而忽视游击战争的思想是错误的。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毛泽东概括了坚持游击战争的18项具体工作。统一战线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策略。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要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毛泽东指出，如果抹杀或抛弃这种独立

“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

□ 刘国成

性，不丢掉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错误认识，就必然会牺牲和破坏统一战线，所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这些正确主张都对坚持抗战乃至取得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

提出科学命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使得我们党在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和指导中国革命上存在薄弱环节，致使党内一度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1937年11月王明回国以后，积极宣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消极影响。究其错误根源在于，缺乏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此，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

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此基础上，对其内涵进行了阐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能把其“当作教条”，而应当当作“行动的指南”，不仅要了解其“一般规律的结论”，更要学习其“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并且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针对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不普遍、不深入的问题，毛泽东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认真研究马列主义，培养一批“系统地”“实际地”而不是“零碎地”“空洞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党员干部。会上，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及方法进行了论述，对以后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确立领导地位，形成以毛泽东为

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众所周知，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从此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但随着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王明回国以后，“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如何坚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重要指示，实际上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诚如彭德怀说的那样：“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张闻天也说：“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会后，张闻天逐渐把党内总负责的全部工作交给毛泽东。就连1939年6月的《共产国际》第6期在介绍毛泽东生平时，称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之一”“不屈不挠的领袖和民族英雄”。这为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供了

条件。**重视党的建设，夯实伟大工程基石。**党的建设是党的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全会对党的建设进行了集中论述，毛泽东第一次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在纪律方面，针对一些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行为，尤其是张国焘明知故犯，无视纪律，破坏纪律，全会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进而要求进行党的纪律教育，使党员干部养成遵守纪律的好习惯。此外，全会制定了详细的党内法规，比如《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刘少奇在《党规党法的报告》中指出，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必须用党规党法去教育党员干部。在组织建设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封建统治的国家，存在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而革命要取得胜利，需要高度积极性的党员干部。要实现这一目的，主要依赖党内生活制度的

民主化，倘若没有或缺乏民主生活，不仅影响党员干部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鉴于此，毛泽东指出，急需在党内施行民主生活教育，使党员干部明白什么是民主生活，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同时，增加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提高积极性，增强战斗力。在干部队伍方面，要“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许多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就不能完成其担负的历史任务。为此，全会指出，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善于识别、使用 and 爱护干部。同时，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军队中，使他们成为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的模范，在友友友军中，成为坚决实行抗战任务、团结各党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成为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成为民众的朋友而不是上司，成为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在实事求是、远见卓识和学习方面也要成为模范，从而为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奠定了基础。

